

挽救生命的科研不能临时抱佛脚

□ 陈雍君

雾霾弥漫京城数日,终于招致对于霾的深入广泛研究;陨石以冲击波的形式伤及千人,才让俄美大国开始考虑联手来对付太空危机——叹!当真正危及生命时,才懂得认真对待!虽然各种教训足够深刻,但这个道理仍然总是被忽视:那些能够挽救人类生命的科研,实在是不能临时抱佛脚去做。

似乎在当今社会文明,自然科学的科研项目已经可以大致如此划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前者,频繁享受鲜花横幅、慰问表彰以及巨额经费支持,后者则默默无闻,仅在危机来临或漏洞被曝光时才得以为人所知。比如最近被人议论纷纷的工业废水地下深井灌注。

实际上,“深井灌注”并不新颖,上世纪30年代起美国就已经开始成熟应用这一技术。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庆和大庆多地也已应用这一技术进行污水处理。但直到最近,一则工业污水污染下水的消息传遍网络,才引出了地下深井灌注的技术话题。各大媒体对这一消息的报道中,显然缺乏对深井灌注技术的一般性了解,想当然地以为中国所有的地下排污都会影响到饮用水安全。而实际上,中国污水地下排放的问题,不在于向地下排污是否合适,而在于如何监管企业按照技术要求排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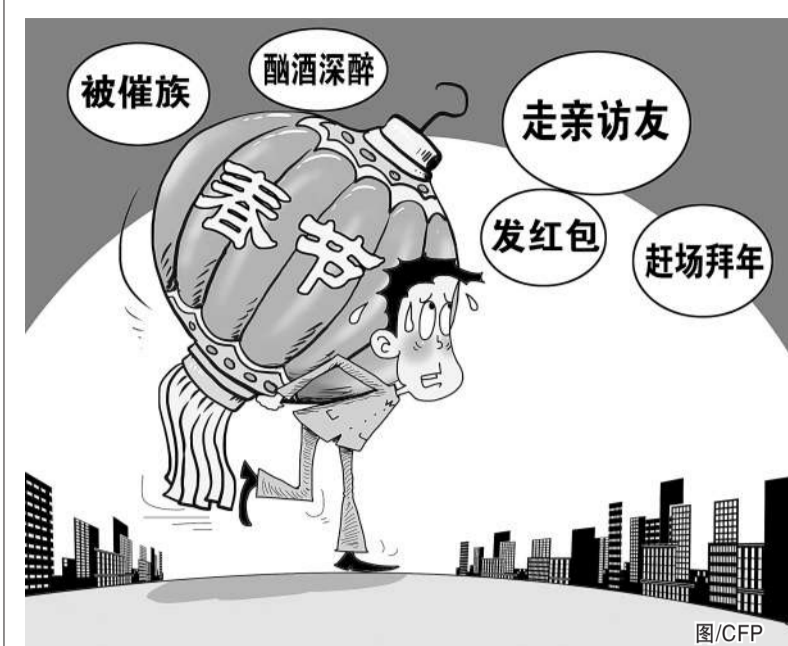
这种平时根本不关注、出了事却一拥而上想当然“打倒之”的现象,看似反映了人们

对于一些偏冷门技术的了解,实则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于那些能够维持和挽救地球生态、保护人类生存繁衍的技术所持有的态度:不是眼前事,无关眼前人。唯有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已经出现了大面积无法忽视的损失时,人们才能把它当成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去看,去处理。

当然,临时抱佛脚也是积极应对的姿态,但若未能雨绸缪,又何必承担不必要的损失?提高经济增长点的科研项目固然耀眼,但那些不挣钱,却保护生存环境,以换取更长久未来的科研项目,同样应备受重视。赚钱的技术,是商业机密,可以藏而不露,但保命的技术,实在是应该挂嘴边;

常念心头,不仅要时时宣传,使之成为社会常识,影响和指导人群的思想与行为,还要提升相关研究人员的待遇,让更多人加入进来。日本全国上下的防震意识是很好的例子,北京雾霾天气的讨论和PM2.5数据的公布,不也成为减少今年春节烟花燃放促进因素吗?

逐利固然是人类的的天性,经济发展也确实是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但若连生存都保证不了,真是任谈牟利与发展。相信至少在百年之内,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基本可以从其如何对待那些虽然不带来短期经济效益,但却能长期挽救人类生命的技术的态度上看得出来。



春节需要换个过法

□ 杨雷

好不容易盼来的春节七天长假,许多人是在辛劳奔波中度过的,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春节。千里归家,走亲访友,胡吃海喝,一年到头的辛苦并没有在假日里得到放松,反而在“收假”时无奈吐出一个字:“累”。关键是,累要累得值得,而这种累,是一种虚耗,耗人的精神,耗人的辛苦钱。

大家都在吐槽,年味变了。依我看,也无需抱怨什么,这只不过是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属正常现象。只是春节的过法还没有适应社会发展,才会衍生出一系列的“春节综合征”。当回家过年成为一场数亿人次的迁徙运动,当春运买票可以催生出一连串产业链,当归家之路的艰辛可以拍成《人在囧途》的贺岁电影,全世界人民都被这神奇的中国式春节震撼了。

几十年来,中国人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流动,在此过程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移民”。例如各客籍在某县城,父辈考学或工作到了省城,而子女这一辈又考学或工作到了京城。这种频繁的迁移,让许多人在春运期间不仅要千里迢迢回自己家,还要马不停蹄地回老家。回老家过年看爷奶奶,她姥爷姥爷;在与舅舅姑姑团聚的同时,还要应酬许多从未有过交情,只是一年见一面或者几年见一面的远方亲戚。这往往让小辈们很是头疼,待在屋里,没礼貌;出来聊天,没话说。父辈也因离家三四十年而出现诸多“水土不服”,全年的辛劳加上折腾一趟,过年只能更为疲倦。

而上述疲于奔波的例子只是当大过春节的诸多尴尬之一,是为“劳民”。至于大吃大喝送礼发红包,是为“伤财”。这种形式上看似遵循传统的过年,却在实质上背离了春节这一中国特有习俗的精髓——团聚。那让漂泊游子能够感到思乡的慰藉,那让辛苦劳作一年的人能够欢欣喜悦,辞旧迎新,那是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劳动人民的精神家园。

我们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一味注重过年的形式而忽视了过年的本质,致使今天这种畸变的中国式春节沦为鸡肋。春节需要换个过法,不要拘泥于形式,要多把握内容,让自己心愉情悦。团聚,亲情,也未必是地缘上的亲近,关键是要有真心。

嫉“污”如仇 才有责任担当

□ 王旭东

近日,有网友反映“山东潍坊许多企业将污水排到1000多米的水层污染地下水”。潍坊市2月17日回应称,截至目前,潍坊市环保局已排查企业715家,暂未发现帖文反映的问题。为进一步调查相关情况,潍坊市公布有奖举报办法,对相关举报人最高将奖励10万元。

将污水排到深层地下水污染地下水,这也太缺德,太狡猾了。《资本论》曾给资本“画像”——“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跃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刑,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这便是资本的劣根性。

企业地下水排污,见证资本“劣根”从深层地下水获取“利润”,可谓“根深叶茂”。相当数量的企业与污染是“黄金搭档”,有人用“一半是黄金,一半是污水”来形容有些企业与污染的依存关系,有地方经济的发展奠定在“牺牲环境”的代价之上,有经济增长“污染”了GDP……当资本品质与良知“被污染”,剩下的只有劣迹。这这一点从我们身处的环境中就能强烈地感觉到。

水是发展的一面镜子。“以水为镜”,不仅能照出环境污染与否,更能照出政绩观正确与否、发展观科学与否。政绩观“污染”是最大的,最具危害性的环境污染。“海口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决?”曾经,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抛出“雷”人之语:“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贵州省施秉县恒盛有限公司195名工人被确诊为矽肺病,创下了企业一次性检出矽肺病人数的全省之最,可这家企业居然还是当地学习的“好典型”。

据《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披露,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生态文明成为政治共识,面对严峻的环境状况,必须对污染“零容忍”,拿出治污“硬举措”,采取去污“强行动”。

地下排污肯定是隐藏很深,不容易被发现,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环保部门要成为“好猎手”,必须告别应付式排查,要有沉下去的作风,要有嫉“污”如仇的责任担当。

别打工程博士培养的“生意经”

□ 徐玢

虽然有国务院明文规定,仍挡不住高校的“收费热情”。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务院学位办在2012年明确不能向工程博士收取学费,但向工程博士收取学费的高校仍不在少数。学费高达6位数不说,部分高校对工程博士还存在敷衍培养的现象。拿工程博士培养做起“生意”,这种做法真是有害而无一利。

高校买卖学位一直是社会敏感问题,博士帽与官帽齐飞的学历腐败现象让人心痛。如果把工程博士也搞成了这一套,只能让中国高校的浮躁之风越刮越烈,让全社会对中国高校再添一笔失望。国家提出培养工程博士,本是希望能够培养出高水平人才,促进我国工程领域的科技进步。很多高校招来工程博士,就采取培养的方式,只管

毕业盖章发学位了事。这不得不让人担忧,工程博士培养有演化成工程领域官员镀金经历的可能。

虽然有高校口头上说,并未把工程博士学位当成赚钱的项目,只是国家直接拨付的培养经费不足以覆盖工程博士培养的直接成本,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赚个差价,弥补学校的亏空。但正如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琛所说:“大学不是工厂,不是做买卖,不能完全追求经济收入与效益。大学的天职就是为国家与社会培养人才。”如果学校把工程博士培养的算盘打得太精,把人才培养变成市场行为,就真的是把自己的职能定位完全颠倒了。试问一切向钱看的高校,如何能成为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摇篮?即使国家直接拨付的培养经费不足的

情况属实,部分高校对培养人才、促进创新的短视也令人遗憾。我国的产学研合作一直存在深度不够、动力不足等问题。我国是工程大国,工程科技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紧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最直接、效果最明显。而工程科技是一门实践出真知的学科,大量的企业在工程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工程博士的培养,可以增进高校与企业双方的相互了解,进而探索可能的结合点。利用工程博士培养的机会,无疑有利于培养具有世界水平的工程科技专家队伍,对高校也是教学相长的机会,其收益远远大于那6位数的培养费用。

所以,奉劝相关高校一句,别打工程博士的“生意经”,如此不仅浪费高教资源,更是浪费了构建产学研合作渠道的宝贵机会。

在虚假学术期刊频出背后

□ 曹丙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这一学术期刊被曝光在学校被合并、主管和主办单位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出版外,《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又被曝光是一本冒用已改名的期刊名义出版的假刊。

虚假学术期刊频出的乱象背后,是国内发表论文的巨大市场需求。笔者的中学教师朋友每每谈起评职称时最苦恼的事情就是发表论文。因为只要在我国要参评职称的,包括医生、护士、记者、中小学教师,甚至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可能都得要发论文才能有资格参评更高一级的职称。据统计,国内每年需要发表的论文数量可能达1180万篇左右,而全国的学术期刊一年

能够发表的论文数量不足300万篇。巨大的供需缺口导致出现一号多刊、假刊、论文代理、论文买卖等学术期刊乱象丛生。

要求发表学术论文本无可厚非,但不能走到唯论文是举的极端。现如今,无论是职称评定、人员晋升,还是学生毕业、人才评价,无不与公开发表的论文挂钩。比如在高等教育领域,首先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统计论文数量,这逼得每个大学要统计论文数量,大学再把任务往下层层分解,最后的结果就是“逼得大家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由此导致的是每年我国产生数量巨大的论文垃圾,与此同时却并没有带来多少对科学技术进步的真正贡献。

学术评价的“泛论文化”在导致学术期刊乱象的同时,也导致了各种学术不端现象的出现。论文抄袭、数据造假不一而足。吉林大学研究人员的一篇论文近日就因使用和包含了未经授权的数据而被国际学术期刊《分子与细胞生物化学》撤销。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严重损害了我国科学界在世界上的声誉,进而也影响了我国研究人员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作为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学术期刊的功能不可或缺。如果连这里都无法保持一片净土,学术的异化与沉沦也就难以避免。规范学术期刊出版,严惩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势在必行。而只有走出这种“泛论文化”的学术评价导向误区,才能标本兼治,学术期刊的乱象与学术不端行为才能根除。

对学术不端行为要痛下“杀手”

□ 赵文红

2月5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对外正式宣布,该校学位认证委员会经过全面调查取证,最终认定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部长安妮特·沙范1980年的博士论文存在隐瞒引文出处及剽窃问题,并正式决定取消沙范获得了33年之久的哲学博士学位。

算起来,沙范是两年来第三位栽倒在学历问题上的德国高官了。沙范涉嫌“剽窃”事件曝光后,德国社民党、绿党等反对派已经公开要求沙范“承担后果”;各大媒体均发表评论呼吁沙范辞职,认为其已“不合适再赖在教育部长的位子上”。

德国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科技界名人辈出的国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德国的科技成就一定与他们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实,科学探索往往伴随着荣誉、地位和商业利益,科研诚信问题也总会如影随形地浮现出来。没有诚信,就会破坏科学研究的秩序,就会影响科学家持之以恒的科学探索和创

造活力,并对科学事业造成损害。

在我国,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在科研诚信和学术风气上已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滋长,正在侵蚀学术的肌体,对科技事业健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术腐败问题处理几乎是“零作为”,致使学术腐败现象在中国内地愈演愈烈,解决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学术道德和科研诚信作为创新文化的核心内涵,渗透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层面。如果不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将严重影响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摇国家创新体系的根基,阻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

遏制“学术不端”要下真功夫。我们应从维护国家科技事业的整体利益和科技工作者的整体声誉出发,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对科研活动的全过程实行强有力地监管,抓住最容易

出问题的领域,加大监管力度,并逐步建立起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科研诚信法律法规与制度体系。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调查核实、监督监察、公开公示和惩戒处置等,都应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如是,方能有效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滋长。

其实,我国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以及《著作权法》《专利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都有相应的条款。许多单位和部门成立了专门机构,监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实际情况看,有些规章和要求还停留在文件上,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一些问题发现了但查处不力,这实际上是容忍学术不端行为对学术道德底线的突破,对整个科技界的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产生了恶劣影响。正确的态度应是“零容忍”,而不是“零作为”。在当前科研经费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更要把“零容忍”真正落到实处,对学术不端行为高下杀手,严厉惩处。如果哪天我们听说有高官因为学术不端行为丢了乌纱,则不必吃惊,理当如此!

“毒校服”再现不可等闲视之

□ 吴佳坤

近日,“毒校服”事件引发大家的持续关注。据报道,上海质监局在对学生校服产品进行质量监督抽查中发现,有6批次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其中欧霞服装厂生产的一款校服被检出染料含致癌物芳香胺。

此次上海“毒校服”事件之所以令人侧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家校服生产厂家是“蝉联”数年里上海“黑榜”的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竟然可以继续为“祖国的花朵”提供校服,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是“上海特产”,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地方查出过“毒校服”,尤其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和贫困地区,“毒校服”的“美丽”身影频频出现。个别生产校服的厂家本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只要有人采购,就敢肆无忌惮地生产“毒品”,根本不把学生的健康当回事。

更让人震惊和忧心的是,有毒校服从生产环节到学校的采购,直至穿到学生身上,竟然是一路绿灯,畅通无阻。按说,对于校服这种批量生产而且容易保存的物品来讲,

相关质检工作的开展不会特别困难,校服的基本质量应该是可以保证的。然而,上了“黑榜”的生产厂家都可以继续生产,并且还能有“市场”,监管部门对学校就可难逃其责了,特别是相关学校,更应认真反思。

校服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学校方面为学生定制校服未尝不可。不过,学校应该选择那些靠谱的校服生产厂家,以保证校服的质量。在这个过程中,健康合理的机制应该被建立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自愿,而不是强迫“建议”学生购买多套校服。其次,校方定制和采购校服,有责任要求做到从生产到加工校服,包括服装的选材、用料在内的整个过程透明化公开化。同时,在保障校服质量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应严防在任何一环环节发生有人从中敛取不法之财的可能性。

“毒校服”再现,不可等闲视之。对于已经发生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进行彻底调查,切实保障学生的正当权益,并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待。

有钱不治“千年狐” 反而广告“玩聊斋”

□ 张轶水

近日,浙江温州下属的瑞安市、苍南县因河道污染,当地环保局长相继被网友邀请下河游泳,引发关注。此种形势下,浙江省温州市环保局在当地报纸刊发整版广告,盘点2012年度的七大成就,称温州去年获得省级环保模范城市称号,遭到质疑。

温州的“河水污染”,温州环保局的“宣传广告”,真是应验了今年央视春晚那句经典:“都是千年的狐狸,你玩什么聊斋啊!”一条“污水河”,就是一条“千年狐”。

瑞安仙降街道的金光村和横街村交界处那条河,若不是“污水横流”,杭州毛源昌眼镜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增敏还愿意赏20万元叫板瑞安环保局局长包振明下河游泳?而苍南县龙港镇龙跃路的那条河,如果不是“满布油污而肮脏不堪”,有网友还敢悬赏30万元邀请该县环保局局长苏中杰下河游泳30分钟?

一个地方,多条河流遭受严重污染,就像一个人患了重病,首先要“知病”,还要尽快去“治病”。2月18日《钱江晚报》报道

“杭州商人出20万邀温州市环保局局长污水河游泳”后,作为被曝光的批评对象,首先应“知污”,接下来,该下大力气“治污”。然而,面对河水污染这一条条“千年狐”,温州市环保局却不惜重金而大打“成就广告”,跟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玩聊斋”:什么“温州市环保局2012年工作七大成就”,什么“公众对生态环保工作满意度提升4.6个百分点,获得省级环保模范城市称号,为2014年建成国家级环保模范城市打下坚实基础”,都是在“秃子头上种头发”!

有钱不治“千年狐”,反而广告“玩聊斋”!这一“玩”竟花去“14万”,河道治污毫无益处;更糟糕的是,这“成就广告”而“一掷万金”,并非出自温州市环保局长个人腰包,而全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这“秃子头上种头发+浪费公款”,完全是“犯错+犯罪”!

面对多条“千年狐”,“玩聊斋”的环保局长,该回家卖红薯去了。

给高科技创业失败者一条“生路”

□ 于永信

探索的社会环境。因此,急需尽快建立和完善宽容失败的社会大环境。

要树立高科技创业失败者也是英雄的社会理念。美国硅谷有一句名言:失败并不可耻。正是这样一种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氛围,才是硅谷高科技产业得以蓬勃发展的“秘密”。高科技创业,要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到现实生产力,有一个从小试、中试再到产业化不断创新、不断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风险,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是科技发展自身的基本规律之一。高科技创业者能拿出个人积蓄,或从风险投资机构争取来资金大胆创业,即使失败了,也充分体现创业者过人的胆识和义无反顾的精神,证明他已然是英雄。当然,说高科技创业失败者也是英雄,并不是纵容失败、鼓励失败,而是呼吁全社会在

赞美、奖励成功者的同时,也能心平气和地看待失败和失败者,能够继续给予失败者以支持,从而鼓励更多的人放心地投入到创新创业的大潮中。

要建立宽容高科技创业失败者的社会机制。创业失败后,创业者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如何保证自己特别是家人体面地生活。创业之初的激情,创业过程中的经费追加,导致创业者往往会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项目上,甚至背上身债,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有时根本无法保证。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考虑建立高科技创业失败者优先救助制度,将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给予相应的社会救助待遇,帮助解决面临的现实生活困难。另一方面,由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创业风险补偿,如高科技创业失败,按企业项目持有人本人在企业注

册资本中第一次实际现金出资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偿,从根本上解决创业者的生活困难问题。

要制定出台鼓励高科技创业失败者再次创业的政策措施。失败是成功之母,在第一次创业失败的过程中,创业者会总结很多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再次创业会有很大的帮助。各级政府应该对因高科技创业失败而处于失业状态的创业者及时提供各种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帮助他们重新就业,在新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特长。对那些立志重新创业的,要具体分析第一次创业失败的原因,对那些确实不是创业者本人原因而导致失败的,政府应该在土地、资金、政策等方面大胆地予以支持,以帮助他们重新实现创业梦想。